

稳预期，青山常在

——两会归来话民营经济之一

本报记者 吴志红

“青山常在，生机盎然。”这是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诗意的期许。过去的一年，中国上亿市场主体经历了疫情肆虐、世界经济下滑的严峻考验，然而，在国家“六稳”“六保”政策支持下，不但青山稳稳，更表现出了极大的经济韧性。新的一年，我们从政府工作报告中，读到了更多的稳企惠企政策，读到民企更多的新机遇。新的经济周期已经开启，青山在，春天就在。

基本盘：稳字当头

这场迟迟还未散去的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3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至2月份宏观经济分析进了一个“两年平均增速”的概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这样解读：“去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主要指标同比增速都出现大幅度下降，由于原来基数的大幅度下降，而显著抬高了今年1至2月份的同比增速。我们通过计算两年平均增速试图剔除低基数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两年平均增速算，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1%，为近年来同期较高水平；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6.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2%。刘爱华表示，从这些数据综合判断，经济总体上处于恢复进程中。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持续恢复还面临诸多风险和压力。在国内，疫情防控的压力犹存，消费、投资等乏力，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太牢固；在国外，疫情尚未得到控制，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所有这些都给中国提振经济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

攻坚破难，首在政策，好的政策就是

生产力的。去年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卓有成效，正是政策之功；经济持续恢复，同样离不开政策的“指挥棒”。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宏观政策要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

这些政策对经济形势的复杂严峻有预见性并有所准备，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坚实的政策保障。

只要上下同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将更加稳健。

市场主体：政策红利多

对市场主体如何保持必要支持力度，我们可以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答案。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把利好政策归纳为间接政策与直接政策。

史丹认为，间接政策，即宏观政策方面，主要有3个方面：扩内需、惠实体、发展实体经济。

扩内需，实际上就是稳定和扩大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今年政府主要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这样就会对整个社会形成很好的拉动作用，也会给民间资本带来很大的杠杆空间。

惠实体，注重发展质量。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金融机构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金融业的发展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

非常突出的位置。发展实体经济。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直接政策，是对中小企业来说最有效的政策。可概括为4个方面：减税费、降成本、惠融资、贴用工。

史丹指出，针对中小企业成本高、融资难等问题，都有相关的措施。对于贴用工而言，降低中小企业的工伤保险费以及社保费用，对企业是直接有利的。此外，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高端创新人才和生产技工短缺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要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还有创新，“创新”一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43次，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科技体制机制，支持更多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贡献了GDP中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越来越精准的政策有助于稳定民企的预期；报告还对科技项目与科技人员直接提出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挂帅”等机制，这项不设所有制门槛的举措，将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自主技术创新投入，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氛围，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新机遇引人注目

在新发展的格局下，民企又将迎来什么样的新趋势？我们可以从全国两会最亮眼的热词中，捕捉民营经济的新机遇。例如，数字经济、“碳达峰”“碳中和”等。

数字经济，数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5.5%，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

率逐年上升，且均高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其中数字经济功不可没，在2020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数字经济贡献了近九成。

民企是数字经济最耀眼的参与者。近年来，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域主要是市场经济发挥更多作用的领域，如衣食住行，涌现出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都是民营企业。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院长沈建光这样看待新趋势：一是疫情加速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二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两大实现形式，其中产业数字化涉及整个传统产业各个方面，是未来数字发展的主攻方向。

“碳达峰”“碳中和”，是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落实到产业层面，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新能源、环保等绿色产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对此，史丹指出，针对“十四五”时期二氧化碳排放和单位GDP能耗的具体目标，节能环保技术、新型装备都会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渠道。

有业内专家表示，未来9年间，我国对光伏产业的投资力度仍将持续加大，所以光伏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处于高度景气状态。对于风电，预计2021年风电项目将出现一波“抢装潮”。

从民营经济的角度，搭上这趟政策的“顺风车”，民企可大有作为。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在财政资金投入上继续倾斜支持，把自身的业务发展和国家的战略有机结合起来。要吃透党和国家政策，用足好政策。

全国两会好声音

朱立锋代表：

将消费“扶贫专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体系

本报记者 高杨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立锋提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可借鉴20世纪80年代日本受美经济制裁期的一个措施，大力发展消费扶贫专柜（即自动售货机）刺激经济发展的有关做法，助力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消费扶贫专柜是自动售货机在消费扶贫领域的应用，在其背后，是一条由采购、流通、销售、消费组成的长链条。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长效扶贫”的思路，消费扶贫专柜的大量投放，能有效打通偏远地区与城市消费群体之间的市场渠道，构建线上线下销售体系，有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朱立锋表示，将消费扶贫专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一是符合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二是消费扶贫专柜在国内市场大有发展空间。三是符合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四是符合疫情形势下“无接触经济”新趋势。

“不过，目前有一些因素制约了消费扶贫专柜发展。”朱立锋说，比如，现在国家缺乏持续性的政策引导，缺乏消费扶贫专柜行业制造标准等等。

朱立锋提出建议：由乡村振兴局等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消费扶贫专柜扶持政策。由工信部牵头制定《消费扶贫专柜制造标准》《消费扶贫专柜运营标准》等消费扶贫专柜行业制造行业标准。建立消费扶贫专柜行业认证体系。建立扶贫产品标识解析及溯源系统。

朱立锋特别提到，目前市场上“三品（绿色产品、有机产品和地理标志产品）”的可信度较差，导致消费者信任不足，溯源系统可支撑食品质量和安全达标认证制度，可以以“三品”标识码唯一性和溯源权威性建设为抓手，严格“三品”达标合格监管制度，保护消费者，促进优质优价机制形成，进而以市场利益引导优质扶贫产品发展，保护守法农户的利益。

梁静常委：

乡村振兴要做好“五个衔接”

本报记者 吴志红

我国在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下一步的乡村振兴如何与脱贫攻坚衔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梁静提出，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脱贫摘帽地区巩固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今后还要做好“五个衔接”。

一是加强规划衔接。要在规划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等方面加强协同衔接。引导脱贫摘帽地区和有关脱贫任务的非贫困区，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在资金投入、项目安排、政策举措等方面优先支持脱贫村和脱贫人口，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二是加强政策衔接。一方面，贫困县村、群众脱贫后，脱贫攻坚主要政策要继续执行，切实做到资金不能减、项目不能少、政策不能变；另一方面，要根据脱贫摘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乡村振兴目标标准，留出一个政策缓冲期、过渡期，防止经济硬着陆。

三是加强投入衔接。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针对贫困地区脱贫时间较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相对薄弱的实际，以脱贫县、脱贫村为重点，在财政资金投入上继续倾斜支持，巩固扩大脱贫成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集中力量办大事。

四是加强机制衔接。在脱贫攻坚战中，各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了许多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包括组织机制、帮扶机制、督查考核机制等，这些制度成果弥足珍贵，应积极运用到乡村振兴中来。

五是加强动力衔接。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实践中，各地针对制约因素和突出难题，探索出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要切实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不仅要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重点领域改革上取得新成效，还要在人才支持、资本流动、金融服务、科技支撑等重要环节改革上求得新突破，以此不断增强发展动力。

薛光林委员：

设立国家级民营企业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孙琳

近几年，国内外形势变化迅速，尤其是去年以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广大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与挑战。为了让民营企业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新形势、新格局之下抢抓机遇实现更好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光汇石油创始人薛光林建议，可由中央政府专门成立民营企业服务中心，作为国家专门机构，规范、引导、培训和帮扶民营企业健康、靠质量发展，让民营经济力量在新形势、新发展格局下发挥更大作用。

薛光林认为，民营企业服务中心可以有以下几个主要定位和功能：首先，可以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协调机构。近年来国家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也会出现落实不好、效果不彰的情况，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没有统一的执行监督和协调机构。民企服务中心可以发挥协调、监督作用，确保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落实。

其次，是民企发展的精准帮扶服务机构。民企服务中心作为一个专门机构，上传下达，充分听取企业意见，深入了解各行各业以及具体困难和问题，协调推动精准施策、精准帮扶，使得民营企业逐步走向正轨和高质量发展。

第三，也是民营企业家的辅导学校、培训机构，负责以理论辅导、心理引导和全覆盖的辅导机制，帮助民营企业家了解市场规则、行为约束和道德规范，帮助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当然，薛光林也提出，这并不是意味着要通过行政手段约束行为，而是更多希望通过服务引导和促进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和企业家素质的自我提升。

“相信通过民企服务中心的以上各种服务举措，不断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可以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民企的关怀，提升认同感和归属感，让民营企业家可以安心、放心、专心，推动实现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经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薛光林最后说。

河北22条措施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高新国）日前，河北省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河北省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聚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等，提出22条具体措施。

《措施》提出，进一步加大金融财政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统计监测体系，建立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全面落实推动企业股改上市融资三年行动计划，发挥各级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发挥担保增信作用，因地制宜开展地方征信平台建设，精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措施》要求，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推动特色产业融通发展，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培育行动，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认真做好长期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中小企业法律政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河北省中小企业法律政策统计监测制度，优化政策直达机制，推动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试评估。



中小企业“云平台”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3月4日，贝发集团员工在生产车间生产笔类产品。浙江宁波贝发集团主营文具、文体、文创类产品及服务。近年来，公司强化资源整合，联合中小型企业建立“云平台”，创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带动文创产业集群发展。2020年贝发集团实现工业产值18.15亿元，同比增长86.66%，出口交货值146712万元，利润总额1.48亿元，同比增长144.22%。新华社发

委员支招：

完善“三新”就业形态的就业政策体系

本报记者 林仪 揭春雁

近年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蓬勃发展，催生了一支庞大的新型就业群体，如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三新”经济从业人员。经国家人社局测算，截至2020年年底，“三新”经济从业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专职从业人员有望达到2000万人。

与这个新生就业群体相伴而来的，就是新问题、新诉求。例如，他们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如何构建适合他们的就业政策体系？全国两会期间，一些委员对此支招。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副主委熊水龙关注到，“三新”从业人员劳动关系不明确、社会保险覆盖率较低、劳动法律救济途径不畅、收入稳定性较差。

熊水龙分析道，“三新”从业人员的工作一般是通过平台网约的形式接单而来，以计件制结算工资，每周工作7天是常态，部分从业人员甚至每日工作超过10个小时，但因其计件制的特点及工作时间的灵

活性，长时间的加班也没有与他们的收入相匹配，同时，在社保方面，部分专职从业人员会选择自行缴纳社会保险，通过平台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也较低。一旦发生平台解约或工伤事故，“三新”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工伤赔偿难以获得，维权途径不畅通。

因此，熊水龙建议，可结合“三新”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需要，省级及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敦促各地互联网服务提供平台区分全日制、非全日制、劳务派遣、劳务外包、雇佣协议5种用工形态，并与“三新”从业人员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雇佣协议，并出台相应参保指南，鼓励按照用工形式的不同参加社会保险。同时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努力保障“三新”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王雪华从完善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支持角度提出建议。他指出，许多有正式工作的人

群利用空闲时间兼职，工作和职业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固定劳动关系的传统劳动法律法规对于新就业形态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他还指出，新就业形态当前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和快消领域，仍然缺乏与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有效衔接，在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中的潜力仍有待深度挖掘。

如何顺应新形势，加快形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就业形态的政策体系？王雪华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对新型就业关系的法律规范，加强对新型就业者的权益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支持力度，将新型就业人才纳入人才政策范围。

王雪华以直播电商为例，建议引导新业态与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有效结合，让新业态赋能传统经济。

但直播带货也是把双刃剑。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副董事长孟丽红说，由于网

络直播准入门槛低，责任不清晰、行政监管机制不健全等原因，直播带货乱象也层出不穷。虽然国家各部门近期出台了一些对网络直播活动的指导意见和管理规定，压实有关主体责任，规范直播带货行业。但法律层面仍需完善专门针对直播带货行业的规定，包括职业主播直播带货时的身份归属广告代言人，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产品可上市的合法性监管和审查，如需要具备卫生检疫证、品质合格证等。

“现有的指导性文件仅规定平台有义务对直播间运营者进行审核、管理、评价及处理消费者投诉等，但并未规定如平台监管不力需承担的法律风险。”孟丽红建议强化平台的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如主播直播产品出现问题，平台、商家、主播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2020年，人社部增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孟丽红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标准，通过培训、考核等方式提高直播门槛。